

西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编

中国现代 民间文艺学家

(第一分册)

王 强 王 康 李鉴踪 编 著

5.6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年·北京

西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所主编

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家

(第一分册)

王 强 王 康 李鉴踪 编著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年·北京

责任编辑：彭武麟

封面设计：谭宝君

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家

（第一分册）

ZHONGGUO XIANDAI MINJIAN WENYIXUEJIA

西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编

王 强 王 康 李鉴踪 编著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2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河北省大厂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144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81001-061-1/I·16 定价：2.15元

目 录 (按姓氏笔划排列)

序.....	(1)
马学良.....	(3)
孙作云.....	(11)
朱介凡.....	(20)
刘半农.....	(24)
李家瑞.....	(31)
何其芳.....	(38)
苏雪林.....	(47)
芮逸夫.....	(54)
周作人.....	(58)
茅 盾.....	(67)
郑振铎.....	(73)
林惠祥.....	(80)
闻一多.....	(87)
娄子匡.....	(94)
钟敬文.....	(100)
赵景深.....	(111)
贾 芝.....	(119)
徐旭生.....	(126)
凌纯声.....	(131)
袁 珂.....	(141)
钱南扬.....	(147)
徐家瑞.....	(151)

顾颉刚	(158)
容肇祖	(167)
常任侠	(174)
常 惠	(179)
杨成志	(185)
杨 堃	(193)
后 记	(201)

一总思潮的一个支脉。正是这个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酝酿和准备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民间文艺学，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新兴学科，就是以民主主义的思想旗帜，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想解放运动中揭开了自己的第一章的。在以后七十年发展中，参加到民间文艺学这一领域中来，从一而终地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并卓有建树的人委实不多，但从不同学科的立场来研究民间文学并作出贡献的倒是大有人在。大致说来，一部分人从历史，语言的角度，一部分人从民族学的角度，一部分人从文艺学的角度，一部分人从宗教学的角度。如果我判断不致大错的话，二、三十年代主要是历史、语言学的民间文艺学的时代，三、四十年代主要是民族学的民间文艺学的时代，五、六十年代主要是文艺学的民间文艺学的时代，到了八十年代，出现了多元的、综合发展的时代。

民间文艺学是一门边缘学科，过去所做的一切，仅仅还属于奠基的工作（既有基础不牢的问题，也有返工的问题），至今还不敢说已经建立了严整的体系。民间文艺学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拓荒的工作，已经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而平坦的道路。当前的任务，一个是以开放的眼光广泛吸收世界各国各种学派的学者们的学术成果，一个是以自信的精神总结我国自己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最终确立民间文艺学的地位，才能建设起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

刘锡诚

1987年12月14日于京郊

马学良

马学良（1913— ），字蜀原，汉族。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授。

1913年6月22日，马学良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1918年2月，入荣成县立模范小学。因幼年家境贫寒，倍受歧视，故发愤读书，立志进取，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全班榜首。1927年2月，考入山东省威海齐鲁中学。半年后，转入济南东鲁中学。因学习优异，只用一年半即完成初中学业。1930年9月，考入山东省立高级中学，三年后以优异成绩通过毕业会考。1933年9月，因病在家乡休养，后经人介绍，到县立师范讲习所任语文教员。1934年5月，因学潮离乡赴北京。

1934年9月，马学良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在任课教师胡适、周作人等文学前辈影响下，文学修养日高，写成明代公安学派《袁中郎年谱》。大学期间，马学良除攻文学外，还先后师从罗常培、魏建功、沈兼士、唐兰等老一辈学者治语言学、音韵学和文字学。1936年写成《荣成方言》和《〈方言〉考原》。后者现已收入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的《罗常培纪念文集》中。马学良在读书期间，每年均因学习成绩优异而获山东省教育厅和荣成县的奖学金。1937年秋，芦沟桥事变后，马学良随北京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在临时大学继续学业。1938年春，又随临时大学由长沙步行至云南昆

明，转入西南联大。西行途中，给著名爱国教授闻一多先生当助手，沿路采风调查，记录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民间文学材料。从此，马学良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的和民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其后漫长而建树丰硕的学术生涯。1938年秋，马学良大学期满毕业，留校作罗常培教授的助教约半年。1939年春，马学良赴云南宣威乡村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同时调查彝族语言、宗教及民俗等情况。日后在《西南边疆》、《边政公论》、《边疆人文》等刊物上陆续发表的《宣威河东营调查记》（1940）、《云南土民的神话》（1941）、《宣威佯族白夷的丧葬制度》（1942）、《黑夷做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1943）、《黑夷风俗之一——除祸崇》（1944）、《悬边人员应多识当地的民俗与神话》（1945）等调查报告和论文，均取自当时所获之丰富材料。同年夏初，返回昆明，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语言专业研究生，直接师从刚由美国回国的国际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以及罗常培、丁声树诸教授。同年底，随导师李方桂先生赴云南撒尼彝族地区实习，记录撒尼彝语，为日后撰写毕业论文积累了翔实的资料。1940年，随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昆明迁至四川南溪县李庄，并在导师李方桂先生指导下，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撒尼彝语研究》，1941年完稿。1951年作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言学专刊第二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较全面研究彝语的学术专著，在国内外引起学术界重视，至今仍是学习和研究彝语之范本。1941年9月，研究生毕业，留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同年秋，赴云南武定、禄劝、寻甸等彝族地区调查彝族的语言、文字、宗教经文及社会历史。1944

年春返回史语所。后因母病，回西安省亲。同时协助黎锦熙先生编纂《陕西县志·语言志》。1947年，在南京先后兼任原中央大学和东方语专的副教授和教授。这期间发表了有关宗教和民俗的论文主要有：《傩文祭经的种类述要》（1947）、《从傩氏族名称所见的图腾制度》（1947）、《傩族的招魂和放蛊》（1948）等。尔后与前述论文一起结集名为《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1951年借调到成立伊始的中央民族学院，筹建少数民族语文系，任系副主任，1964年任系主任。从此，马学良教授把后半生全部奉献给了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筚路蓝缕，尽心竭力，三十多年来为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至今桃李满天下，许多人已是民族语言文学等方面的著名学者。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法国巴黎参加第12届国际汉藏语言学议。1983年应日本民间文学界邀请出访东瀛。1984年赴美国访问讲学。1987年赴巴基斯坦访问，交流中巴民间文化，同年出席香港国际语言研讨会。自1985年后，马学良教授退居二线，专心从事研究著述和培养研究生。几年来指导了十多名语言民族学、彝族古籍文献、民族民间文学、彝族文学、双语教育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对此，党和国家给予马学良教授很高荣誉。自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文学系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文学》卷主编以及《民族》卷和《语言》卷少数民族语言分支的副主编、国家民委《五套丛书》语言简志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以及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协会副会长等。

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民间文艺和民俗事象丰富多彩，其文化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因其民族、语言、地域等多重阻隔因素，使得有关这一领域的搜集、整理、翻译以及学术研究，都具有特殊性和一定难度。如果不深入并长期居住在被调查民族中进行深入细致的采风调查，如果不具备严谨、坚毅、认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则难以登堂入室，更遑论窥其堂奥。马学良教授积50年之亲身经验，深知个中之味，不仅在民族语言、民族教育等领域有杰出的贡献，在民族民间文艺学上的理论创见也是学术界熟知而值得倡导的。大致归纳其要者有三：

其一，强调民间文艺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早在1959年11月号的《民间文学》上，马学良教授在《更多更好地翻译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一文中指出，语言问题是研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根本问题之一。1981年，在《民间文艺集刊》第一期上发表《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一文，又从搜集和整理的角度再次强调：“研究民族文学的第一个要素语言，是搜集、整理、翻译各民族口头文学的重要工具，…这也是由于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具体情况决定的”。1982年在《少数民族文艺研究》第一集撰文《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语言学、民族学的关系》，马学良教授在文中表示了他的忧虑：“在现阶段能应用语言科学知识去搜集、整理、翻译民族民间文学的人还是很少”。由此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只凭梗概即随意加工，甚或向壁虚构、歪曲原作等现象，“这不但破坏了原作的真实性，而且

损害了原作的艺术形象”。因此提出，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应具有语言科学的知识，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要忠实记录。这一见解可谓马学良教授治学经验之谈。早在40年代，马先生在赴云南调查彝语时，就是利用语言学的方法，通过记录彝族民间口头文艺作品来学习和研究彝族语言文学。因其所用方法的科学性，从而保证了材料的真实和研究的质量。其后，马学良教授在《〈苗族史诗〉序》（1983）、《民俗学与语言学》（1984）、《民俗学、民间文学离不开语言学》等一系列论文和各种不同场合中，都一再重申并不断深化这一学术观点，使之更臻完善，更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性。而马先生与本民族同志合作整理翻译出版的《蝴蝶歌》（苗族）、《金银歌》（苗族）、《苗族史诗》、《阿诗玛》（彝族）等民间文艺作品，正是依据这一学术观点和方法身体力行所获得的成果。

其二，精辟分析了民间文学与宗教的密切关系。多年来，宗教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以及宗教在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地位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未能深入探讨而又不容回避的。1980年，马学良教授与人合作，在2月号的《民间文学》上率先发表了《民族民间文学与宗教》一文，为本源作振臂呼。文章指出，在原始宗教阶段，民间文学与宗教密切结合，是表现原始宗教观念的艺术形式，表达了原始人类虔诚、热忱和朴实的情感。许多民间创作保存于宗教仪式中，既是宗教观念的基础，也是民间文学推广的源泉。这些与后来的“人为宗教”利用民间文学作宣传有着质的区别。文章立论新颖，观点鲜明，材料翔实，令人耳目一新，在“解冻”未久的学术界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意义深远。三年

- 7 -

后，在同一刊物上，马先生再度与人合作，又发表了《再论民族民间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文章尤其强调指出，原始宗教和原始的民间文学是在同时同一基础上产生的，甚至可能就是同一个东西。所以一定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民间文学，不能一涉及到神灵的文艺作品就统斥之为宣扬迷信的毒草。同年，在《世界宗教研究》第二期上发表的《明代彝文金石文献中所见的彝族宗教信仰》一文中也指出，研究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宗教，则反映这一民族意识形态的民间文学，如神话、传记、故事和史诗等，都是重要的材料，应加以利用，互为印证。实际上，我们纵览马学良教授一生的学术研究，可以说，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研究也是他的一个主要课题，而且往往都是将与之密切有关的民间口头文学一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综合分析。早在30—40年代，他深入彝族地区调查，跟彝族巫师学习彝族宗教经文时，就已经奠定了这一科学的学术观和方法论之基础。收入《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一书中的《灵竹和图腾》、《傩族的巫师“贝耄”和“天书”》、《傩民的祭礼研究》、《傩文作祭献药供牲译注》以及前举各文等，均贯穿体现了这一治学观。岁月磨励，治学日精，这一观点更臻鲜明而完美，终在一个特定的转折时刻给学术界以振聋发聩的促动。由此显示了马学良教授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见地。

其三，倡导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应具备广博的民族文化知识。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大多无文字，其民间口头文学又多与其社会上的典章制度、风俗习尚以及物质文化等浑然一体，这是有别于汉族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这已引

起人们注意，但是，马学良教授在《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语言学、民族学的关系》一文中阐述得更为详细而明确。他指出，民族学是研究现今各民族的形成，发展及相互关系问题的变化规律的学科。它包括民族语言、文化、地域、社会组织形态、经济形态、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多方面的内容。民间文学，仅仅是整个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不学习和了解民族学，对民间文学的研究也必然是孤立的、表面的、肤浅的。这一见解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文中列举了南方少数民族洪水神话兄妹结合以印证原始社会的血缘婚，藏族史诗《格萨尔》以印证唐代吐蕃与南诏之间的争战，彝族长诗《勒俄特衣》以印证母系氏族阶段，等等，材料翔实，论述有理，很有说服力。如果说其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更为重视从宏观的民族文化角度对被研究对象作综合分析进而取得更好成果的话，应该承认，马学良教授的这一学术见解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追溯起来，可以说，马先生的学术生涯，就是发端于语言学和民族学！他在《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自序”中也说：“我的体会是，研究彝文经典，必须先通彝族礼俗。以礼俗释经，经义自明，反之以经说明礼俗之所据，更可明礼俗之源流。”书中文章虽各有侧重，或宗教，或神话，或礼俗，或歌谣，但都相互联系，互为印证，比之单一论述，更其全面、立体而透彻。既可视之为民俗学文集，也可视之为民间文学论稿，更可视之为民族学专著。通过忠实记录的民间文学材料以透视民族文化背景，二者相互印证，对二者的研究都同样有益。从那时起迄至今日，马先生都一直倡导并亲身实践着这一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这也是他之所以在这一学科中建树丰硕的主要原因

之一。1985年，马先生在《古礼新证》一文中，通过将汉族文献记载的“椎牲”、“社祭”、“衅礼”、“相见赋诗”等古代礼俗，与苗、彝等少数民族现存民俗事象进行比较研究，作出了新的解释，拓展了民族学、历史学以及民族民间文艺和民俗学研究的新途径，给学术界带来一股清新气息。

以上只是笼统的概括，马学良教授在这一学科的理论创见远不止这些。但窥一斑可知全豹。除了前举各文及专著外，马学良教授还撰写发表了数十篇论及这一学科的文章，翻译出版了好几本少数民族民间长篇口头文学作品，主编五卷本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硕果累累，贡献不凡。至今，虽已届古稀之年，仍壮心不已，正与研究生和助手一起继续40年前即已着手的大型《彝文经籍辞典》的编纂；还与研究生为周谷城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撰写了国内第一本《彝族文化史》，并计划编写《民族文学概论》等著作。但是，他并不以此而自满。他曾在《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自序”中谦逊地说到：“古人悔旧作。我这本文集，并非敝帚自珍。……或可供研究彝族礼俗发展过程中的参考吧”。虚怀若谷，至今不改初衷。

国运昌隆学运盛。在建设四个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马学良教授有生之年仍在贡献余热，奋发有为。

（蒙宪）

孙作云

孙作云（1912—1978），字雨庵，汉族，辽宁省复县西海村人，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历史学家。孙作云出生于1912年正月初六（公历2月23日）。闭塞的山村，保留着许多古老的遗风遗俗，诸如跳大神（巫术）、打单鼓以及岁时节令风物，孙作云自幼身濡目染，印象深刻。1918年2月（7岁）就读本村小学，1924年12月小学毕业。翌年春，考入复州城内复县初级中学。1927年11月间，孙作云对学校处分学生不满，参与学生罢课，遂被除名。经过自修和补习之后，1928年（16岁）考入沈阳东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冬夏不辍，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方面的著作，受到新思想的熏陶，对左翼新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粗浅地认识到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梦想将来要作一个诗人，一个时代的歌手。孙作云曾担任附中校刊的编辑。

1931年7月（19岁），孙作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北大学附中，学校特准免试升入东北大学。但是，孙作云孑然一身来到左翼作家的诞生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不久，爆发了震撼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白山黑水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孙作云热血沸腾，参加罢课示威，抬棺游行，走出课堂，到街头宣传，四方募捐，赴南京

向国民政府请愿。1932年1月28日，日寇武装进攻上海，激起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抗日的壮举，复旦大学学生组织义勇军，孙作云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十九路军，在翁照垣将军率领的138旅担任组织民众、为前线杀敌的将士运送弹药给养的任务。战局的急剧变化，“学生军”解散了。孙作云乘船回到老家，1932年4月与徐桂芳女士订婚。是年金秋，考入北京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这是一所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孙作云跟随闻一多先生学“国文”，选修《楚辞》，师生三人相对而坐，上课如同座谈。半年之后，读完《天问》，它为孙作云治学奠定了一块基石。在连续听了闻先生两年的《楚辞》课，又读到闻先生的《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后，有所触发，认为《九歌》的山鬼也是高唐神女，山就是巫山，鬼就是神女，《九歌·山鬼篇》就是楚国宫廷祭祀先妣或高媒的乐章。闻先生听了这个意见之后非常高兴，在1936年4月3日致游国恩的信中说：“清华学生孙君顷撰《九歌山鬼考》一篇，大意谓山鬼即巫山神女，列证甚多，大致可信”。在闻先生的鼓励 and 帮助下，第一篇学术论文《九歌山鬼考》刊载在1936年《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孙作云是当时清华园中有名的书呆子，担任过《清华周刊》杂志的编委，1935年5月发表《论现代派诗》，并发表许多新诗作品。

1936年（24岁）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秋天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导师是闻一多先生。这一时期，孙作云主要致力于《九歌》研究，发表的论文有《九歌司命神考》、《九歌湘神考》（此文为大学毕业论文）、《九歌非民歌说》，译有青木正儿《楚辞九歌之舞曲的结

构》。孙作云的学术研究是从《九歌》发轫的。古代的祭祀，与其阶级地位相适应，《九歌》中的天神，地祇不是普通百姓所能祭祀的，于是提出《九歌》是楚国国家祀典的乐章，“这种学说成为《九歌》研究中影响很大的流派”，孙先生沿着闻氏的治学途径，把《九歌》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清华校园，炮声、飞机声隆隆震耳。7月19日，孙作云送闻先生回湖北浠水老家后，闻讯祖母病故，于9月29日奔丧故里，终止学业。1938年7月重回北京，在“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任编纂参与，进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工作，历时三年有余，编成《经类·诗经类目录》、《史部·金石类目录》各一本，助编《子部·艺术类目录》一本，补写《史部·地理类·方志之属》东北县数篇及《子部·艺术类·食谱之属及游戏之属》提要10余篇。

1941年秋，孙作云受聘于北京大学文学院，任讲师、副教授，讲授《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民俗学》、《楚辞》、《中国古代史》诸课。此时，除撰写《九歌东君考》（1941年）外，全部精力集中于史前史的研究，主要著述有：《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研究》（1941年）、《夸父槃瓠犬戎考》（1942年）、《飞廉考——中国古代鸟族之研究》（1943年）、《鸟官考——由图腾崇拜到求子礼俗》（1943年）、《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之图腾遗痕之研究》（1944年）、《后羿传说丛考——夏初蛇、鸟、猪、鳖四族之斗争》（1944年）、《中国古代鸟氏族诸酋长考》（1945年）、《说鸱尾——中国建筑装饰上图腾遗痕之研